

论党项夏国的骑射文化

崔 星,崔凤祥

(浙江建设学院人文系 杭州 311231)

摘 要: 党项夏国骑射文化的形成,是与生存的自然环境、生产方式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。正是由于尚武、重勇,党项族在同大自然、各部族的征伐抵抗中,从弱到强,在严酷现实中发展、壮大,使骑射这一历史悠久、内容宽广的传统文化,承袭数百年,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之中,形成了无畏、不屈的民族性格,这对今日保护和传承该文化有着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。

关 键 词: 党项族;西夏;骑射文化

中图分类号:K246 文献标志码:A 文章编号:1004-4922(2011)05-0078-05

骁勇善战,终日与马为伴,被称为“雪山民族”、“草原民族”、“骑马民族”的党项族,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。该民族于公元1038年建立大夏国,又称“大白上国”(宋、辽、金称“西夏”),建都兴庆府(今宁夏银川)。其领地“东尽黄河,西接玉门,南接萧关,北控大漠,地方万余里”,历时190年,先后与辽、北宋和金、南宋鼎足而立,称雄一方。在对外的一系列战争中,屡战屡胜,少有失利,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骑射文化的传承与延续,发扬与光大,其威力为宋、辽、金等所重视和畏惧。通过骑射活动增强军事实力,形成无畏和强悍的民族精神,达到培养合格的兵丁、扩充疆域、获得更多生活资料的目的。党项族以骑射见长,部民“秀士高十尺身,马健壮,五彩镫。其人面多黧墨,善骑射,有长身至八九尺者”。民俗“强梗尚气,重然诺,敢战斗”,“修习武备,高上勇力鞍马骑射。”西夏有良弓骏马。《文海》释“骏”为“马也,良马也,马之谓”;释“午马”为“马匹也,马也”;释“良马”为“良驥也,骏也,良马也,马中良之谓”;释“驢”为“驢骏也,马也,良马也,马中良之名是”^[1]中唐诗人元稹就有“北买党项马,西擒吐蕃鹞”^[2]之句。唐代

的边镇节帅为了得到党项族的“善马劲马”,不惜以铁甲兵器竞相贸易。至宋代,“党项马”更是天下名贵商品,南宋人洪遵说“臣询之知马者云,马出夏国者为上,部落者次之,茶马司所买熙河马又次之,川产杜生马为下。”^[3]可见,当时的“党项马”为天下之最。马是党项族的立国之本,在西夏政权中设有专门养马的机构“马院司”。即使西夏中后期屡经改革、变动,但这一经济管理机构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、政权嬗变而取消,自始至终存在着。这种对马的高度重视,为本民族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,使骑射这一历史悠久、内容宽广的传统文化承袭数百年,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之中。

一、党项族骑射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

1. 艰苦的生活环境。作为西夏主体民族的党项族,早年生息在青海、四川、甘肃交界的辽阔苍茫草原上,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生活。《旧唐书》记载:党项人“畜牧牛马羊以食,不耕稼,无文字”。“每姓别自为部落,一姓之中分为小部落,大者万余骑,小者数千骑,不相统一”,“男女服装褐,披毡以为上饰。俗尚武力,无法令,各为生业,有战阵则

收稿日期:2011-07-16

作者简介:崔星(1983-),女,宁夏银川人,讲师,主要从事西夏研究;崔凤祥(1956-),男,宁夏银川人,教授,主要从事西夏军事体育研究。

相屯聚。无徭赋 不相往来’，“三年一聚会 杀牛羊以祭天”。由于这里地势险峻 生活水平及文化生活极为落后 加之气候多变 霜雪期长等种种不利的条件 将他们锻炼成习劳耐劳、健劲勇迈、奋发乐观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民族。

2. 狩猎生产习俗。党项族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和丰富的狩猎经验。狩猎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，也是其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。“河湟间，少五谷，多禽兽，以射猎为事”。立国后，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狩猎业，明言“吾朝立国西陲，射猎为务”。西夏广泛流传着皇族射虎英雄的动人故事。以精湛的狩猎技艺获取丰硕的狩猎果实 被西夏人视为极大的光荣。

3. 频繁的军事斗争。党项族的发展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，因此对军事斗争极为重视。若从公元881年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“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”算起，西夏则历时达347年之久，时跨五个世纪，但其战事相对稀少的时间还不足100年，其余时间，可以说是“点集不逾岁，征战不虚月”。这个政权曾经帮助唐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，参与五代君王混战；又以武力反抗北宋王朝蚕食，继之以武力扩张。立国后，与其邻国关系紧张，和北宋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。同时，又先后攻灭了甘州回鹘、凉州吐蕃，与羌唐吐蕃屡次进行激烈的征战；与久已结盟的辽朝也曾兵戎相见；还与取代了辽的金王朝进行了数十年的争斗；最后顽强抗击蒙古铁蹄的猛烈进攻直至灭亡，其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。

二、精于骑射的君王

党项族上至国王皇室，下至一般百姓，个个善骑射。《宋史·夏国传》记载“继迁，继俸族弟也。高祖思忠，尝从兄思恭讨黄巢，拒贼于渭桥，表有铁鹤，射之没羽，贼骇之。”可见思忠臂力之大，射术之好。征讨黄巢起义胜利后，唐人李琪有诗云“飞骑经巴栈，鸿思及夏台，将从天上去，人自日边来。”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党项将领能骑善战的形象。

为西夏奠定国基的李继迁也是一位善于骑射的杰出首领。《西夏书事》卷三载“继迁善骑射，饶智教，尝从十余骑出猎，有虎突从山坂下，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，自引弓踞树颠，一发中虎眼，

毙之，蕃部由是知名。”^[4]可见，李继迁非凡的武艺对于他在党项诸部中树立威信产生了很大的作用。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同样是一位“善骑射”的君主，“每举兵，必率部长与猎，有获，则下马环坐饮，割鲜而食，各问所见，择取其长”。晋王察哥“雄毅多权略，引弓二石余，射洞重甲”。齐王彦忠“善骑射，饶武略”，横山一带的党项族“引弓甚劲”。西夏的几个皇太后也表现出非凡的尚武气质，毅宗谅祚的母亲没藏太后和崇宗乾顺母梁太后多次出征，既是指挥数万大军的女统帅，又是披坚执锐、征战沙场的女将。

三、西夏战马

“马者，兵甲之本，国之大用。”对于古代战争，战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，“自古论兵，必以马为先”。“军队中有足够数量的马匹，就仿佛（现代军队）装备相当数量的坦克车一样”^[5]。历代中央王朝无不把马政作为一项军国大事来抓。特别是对于西夏来说，与宋、辽、金相比，国小实力弱，在作战中，军队往往“每有事于西，则自东点集而西；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；中路则东西皆集”，能够“忽尔点集，并攻一路，故夏众号十余万人”，更多地采用运动策略，要求军队有更强的机动性。因此，骑兵在西夏诸兵种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因其重要，元昊时专门设立“群牧司”，“司内外九牧国马”负责国马蕃息。西夏占据的河西走廊和陕、甘、宁、河套地区的天然牧场，自古以来就是匈奴、鲜卑、突厥等众多游牧民族驰骋、活动、生存之地，也是中原王朝重要的养马基地。唐朝时，有大批突厥人被安置在鄂尔多斯地区从事畜牧业。河西走廊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水草丰茂，宜畜牧，早在汉代时，就以养马而著名。当匈奴失去这两个天然宝地后，沉重地唱道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不仅凉州是“畜牧甲天下”之地，而且瓜、沙诸州也是传统的畜牧基地，“素鲜耕稼，专以畜牧为主”。正是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深厚的牧业传统，为西夏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《旧唐书》和《旧五代史》中说：党项“马最多”，“所售过常直”，不仅马的数量多，而且品种好。苏舜卿曾在《庆州败》一诗中将宋、夏骑兵的马作了鲜明的对

比 宋朝骑兵“马肥甲重士跑喘,虽有弓箭何所施;连颠自欲堕深谷……”而西夏骑兵“虏骑笑指声嘻嘻,一麾发伏雁行出,山下掩截成重围”。“一麾发伏雁行出”一句,将西夏骑兵骑术之精,马匹之良,纪律性之高,战斗性之强和盘而托。在贺兰山下西夏陵区出土的石马,双耳上耸,二目圆睁前视,有眼角刻线,口微启,唇略涂朱彩,额门鬃毛中分贴于脑际,颈上鬃毛较长,倒向后边斜贴颈部,呈清晰的线条状。甘肃武威西夏墓出土的彩绘木版画中,有一幅驭马图,图中的马引颈翘尾,作飞奔姿态。党项族原来生活的黄河九曲之地,是我国著名的河曲马和浩门马的产地。

西夏频繁的战争,所用马匹数量很大,如果按照西夏军队 50 万人计算,约有 20 万正军,每一正军一匹,就有 20 万匹战马,所以马成为百姓家家户户必备之物。文献记载有健马、壮驼八十余万。这些马用于作战,应是良马。因此,西夏政权对战马的精心选择、饲养非常重视。西夏文《大唐三藏西天》中,详细记载识别良马的知识。在西夏文法典《天盛律令》中规定“官牧场之马不好好养育而减食草者,计量之,比偷盗法加一等。未减食草,其时检校失误致马羸瘦者,当视肥马已瘦之数罚之,自杖罪至一年劳役,令依高低承罪”。“若官马膘弱未塌脊,一律答二十;羸瘦而塌脊,则答三十”^[6]。可见西夏对官马的饲养情况经常检查。该法典中还规定“马院所属熟马、生马,及所予汉、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,生癰疮者,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遣医人视之。”由此可见,西夏不仅有多品种的良马,而且还有“官牧场”和“马院”等专门机构;有“马工”、“马医”的分工,分别负责饲养、调教马匹和治疗马的疾病。《文海》中有关马患病、生疮、蹄生疮等辞条。《元史》中记载一位党项族兽医“至元六年,授本军千户,佩金符。俄略地淮南,所向无前。时国兵初南,塞马当署,往往疥厉,昂吉尔以所部马入太行疗之,所病良已。由军中马病者,率以属焉,岁疗马以万数。”昂吉尔治疗马病的技术水平很高。宋代对军事问题很有研究的丁度曾经说过“羌戎山下山阪,出入溪涧,中国之马不如也。”对西夏的战马大加称赞。

四、西夏骑兵“铁鹞子”

西夏最精锐的骑兵部队莫过于由党项贵族子

弟组成的“铁鹞子”。“铁鹞子”,铁者,带甲也,鹞者,轻捷如鹰鹞也。“铁鹞子”军待遇优厚,选用的都是好马,配备的是最好的装甲和马鞍。所以,他们表现得极为轻捷剽悍,战斗力极强,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。《宋史·兵志四》记载它“有平夏骑兵,谓之‘铁鹞子’者,百里而走,千里而期,最能倏往忽来,若电击云飞。”在平原旷野作战时,常以“铁骑为前军,乘善马,重甲,刺斫不入,用钩索绞联,虽死马上不坠,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,阵乱则冲击之,步兵挟骑以进。”^[7]这种带重甲的铁骑部队,行动居然如此敏捷,驰骋竟如此迅速,令人难以置信。宋人颇为感慨地说“贼始纵铁鹞子冲我军,继以步奚,挽强注射,锋不可当,遂致掩覆。”《宋史》中还载道“夏人纵铁骑渡河,或曰‘此号‘铁鹞子’,当其半济击之,乃可有逞,得地则其锋不可当也。’”公元 1082 年,宋采取进筑之策,派侍中徐禧于夏、银、宥州交界处修筑永乐城。城刚筑就,西夏即发兵 30 万来攻,徐禧与将领们登城瞭望,西夏兵遍布原野,铁鹞子首先抢渡无定河,为后续部队开路,锐不可当。宋方郤延先锋军首先出战,立即败下阵来,永乐城很快陷落,宋军自徐禧以下死亡 12000 余人。可见西夏的装甲骑兵具有多么强大的征战能力,是西夏军队很有特色的武装力量。

五、西夏弓

西夏人使用的猎具,主要是弓箭。弓箭制作的优良与否对射箭的精准有很大的影响,就如同骑术要倚仗于马一般,骑射弓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有良马而无良弓非良骑;有良弓而无良马,非良射,二者对于骑兵来说缺一不可。党项族自古长于骑射,他们狩猎与征战不仅离不开良马,而且也仰仗于良弓劲弩。西夏盛产牦牛(又叫竹牛),其角既长又硬,是制作弓身的极佳材料。康与之《昨梦录》载“西夏有竹牛(即牦牛),重数百斤,角甚长,黄黑相间,用以制弓极佳。”这种弓不仅性能良好,而且美观耐用。弓弦,多用牛筋、鹿筋、狗筋为之。箭杆,多用木质制成;箭头,多是金属(主要是铁)制的带有许多“刃艺”(即倒刺)的镞,镞形不一,以“三刃箭”(即三棱箭)为多;箭尾,开叉并设羽。“西夏弓”用料讲究,制作精良,名声远播。庄绰《鸡肋编》云“西夏兴州出良弓,

中国购得,云每张数百千。”西夏制作的一种劲弩,号“神臂弓”,被公认为当时最出色的武器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道“熙宁中,李定献偏架弩,似弓而施鞞。以鞞距地而张之,射三百步,能洞重札,谓之‘神臂弓’,最为利器。”这种“以鞞距地而张之”的神臂弓,就是汉代所谓“蹶张”。中原失传,而西夏国独存。崇宗乾顺时,为对付宋军的“陌刀法”,西夏建立有强弩军。《西夏纪》卷二十二记载:“……今宜选蕃汉壮勇,教以强弩,兼以鏢牌,平居则带弓而锄,临戎则分番而进。”神臂弓不但在西夏广泛使用,而且在宋朝亦十分流行,是一种很先进的远射武器,其实弩也,以廐为身,檀为鞘,铁为枪鞞,铜为机,麻索系扎丝为弦,已经是一种机械系统。神臂弓威力之大,使宋廷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训练,在《宋史·兵志九·训练之制》中多次提到宋军中加强神臂弓训练的记载。“神臂弓”其形制非常大,元顺帝时,陇西地震,会州公宇中墙崩(会州是西夏旧境),获弩五百余张,长者丈余,短者九尺。这种大型弓弩的大批出现,不仅反映了党项族射术已达到了一个十分高的水准,同时也反映了党项族制弓工艺的进步。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时,得西夏“神臂弓”赐名“怯延兀兰”;西夏人被命为“怯怜口”(皇室家族私属),行营弓匠者,达百户之多。《元史》载“太祖既定西夏,括诸色人匠,小丑(唐兀人朵罗台的祖父)以业弓进,赐名怯延兀兰,命为怯怜口行营弓匠百户”。蒙古人称党项人为唐兀人,为色目人之一。西夏乃制弓民族,为中国的弓弩的发展,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六、骑射教育

西夏大臣野利仁荣曾说“国家表里山河,蕃汉杂处,好勇喜猎,日以兵马为务,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,因其俗而严以刑赏,则民乐征战,习尚刚劲,可以制中国,驭戎夷”^[8]。为提倡和保持其民族“好勇喜猎”固有之俗,西夏凡“年六十以下,十五以上皆自备介甲弓矢以行”;夏人每欲入侵,“举国而来号称百万,精壮居前,老弱居后”,全国动员,全民参战,故“人人习骑射,乐战斗,耐饥渴,其亲冒矢石,蹈锋刃,死行阵,若谈笑”。“至于辽、宋,旧事战伐,故其民多武勇而少文理”,形成浓厚的习射尚

武、勇于征战的风尚。《文海》中对“靶”解释为:“靶箭也,射标也,射处也。”表明西夏射箭有专门的训练或是比赛活动的存在。西夏人在秋冬时都要进行狩猎活动,并作为西夏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和统治者习武的重要措施。即每年十月,国王要率军队到贺兰山行猎,揭开狩猎的序幕;而到了年终腊月,国王也要出外射猎。由于统治者喜好狩猎,老百姓更是上行下效。《圣立义海·十月之名义》载“十月冬季国宴宫宰慧献马领国人射雕。君德智孝合天奉口口草果一切不种自成十月收年国人饱谓也。十月风黑鹿嚎声如草茅风声黄羊林丛逃族地国口追射。十月时时天霜放蒲草尽杀枯使君天與依顺军行兽行也谓。”党项人纵马贺兰山,用弓箭射杀飞禽走兽,也结网捕猎野兽。此时,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,但狩猎这一传统刺激的马背民族活动项目仍然保留着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狩猎活动,也就是军事活动。

西夏是在辽、宋、金等各方军事力量相互对峙下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,所以骑射这一传统文化在政权的建立、巩固、发展、壮大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种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它不但增强了一个民族的军事实力,而且形成和发展了民族团结、无畏和强悍的民族精神。西夏战马、铁鹞子军、神臂弓等威震四方,西夏经历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改革。这是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融合为一体的结晶,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史金波,白滨,黄振华.文海研究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3:401.
- [2]元稹.元稹集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:268-269.
- [3]黄维.历代名臣奏议[G].台北:学生书局,1954:3204.
- [4]周春.西夏书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:649.
- [5]史念海.河山集[C].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6]史金波,聂鸿音,白滨.天盛改旧新定律令[M].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00:580.
- [7]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:14028.
- [8]吴广成.系下属是校证:卷20[M].龚世俊等校证,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1995.

[责任编辑 张松]